

北疆旭日

牡丹江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

中共牡丹江市委党史研究室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综 述

孙联军

1945年8月，牡丹江回到了人民手中，从1945年8月16日，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党中央和东北局及北满分局的领导下，牡丹江地方党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牡丹江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支援东北解放乃至全国解放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下，迅速向东北派出大批军队，妄图“控制华北、抢占东北”。我党正确判断形势，作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派2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东北局率领二万干部和十一万大军，开赴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中分析道：“应当指出，国民党在东北没有深厚的组织基础”，因此，“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

事、政治的根据地。”1945年11月，东北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国民党的大批军队已进入东北，从而形成敌强我弱的局面；二是国民党政府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想从苏军手中接管东北。11月30日，由陈云主持起草，以他及高岗、张闻天三人名义发出给东北局并党中央的电报《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在分析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和美蒋勾结与我必争东北的基本形势后指出：“国民党在占领山海关、锦州之后，正在准备向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推进；苏联又要我们军队退出大城市，”因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远离大城市的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的根据地，”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逐步改变力量对比，最后夺取全东北。北满分局的实事求是的观点和主张，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12月24日，刘少奇指示东北局“你们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今天的中心工作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同时强调指出：要“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为党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了东北工作的方针，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北满分局确定的工作战略完全符合东北当时的实际，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科学延伸，说明这一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和中国革命的一致性。东北各级党组织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标志着革命终将走向胜利。而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从反动统治方式——占领大城市，把

中共逼入贫困边远的农村“自生自灭”的梦想中醒悟过来，决定了他们最终必然失败的命运。苏联为了扼制美国力量的深入渗透，在它与美国之间建立一个双方力量避免直接接触的真空隔离带，以保障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安全利益，在把大城市交给国民党的同时，又扶持中共在东北的发展。由于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随苏联红军率先进入牡丹江地区，实际地接管了牡丹江政权，很快在牡丹江站稳了脚跟。而国民党在牡丹江地区除一些特务及匆忙委任的伪军和土匪外，没有被国民党正规部队占领。这就使牡丹江地区成为党中央所说的“可靠地区”最理想和首选的落脚点。由此，牡丹江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的意义和地位便凸现出来了。

(二)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恢复建立各级党的组织，以领导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工作，是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8月16日，牡丹江市解放，抗联干部金光侠、陶雨峰、乔树贵（姜振江）等率领在苏联休整后的抗联小分队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进入牡丹江，并且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立即建立了牡丹江卫戍司令部，司令陶雨峰，政委金光侠，维持刚刚解放的牡丹江的社会治安。9月15日，根据在苏联抗联教导旅成立的东北党委会的指示（当时的东北党委会实际具有全东北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作用），建立了中共牡丹江地区工作委员会（兼做市委工作），书记金光侠，委员陶雨峰、乔树贵，隶属东北党委会领导，任务是，恢复党的组织，组织人民革命武装力量，指定陶雨峰配合苏联红军，清剿日伪残余。并通过组建东北人民民主大同盟和朝鲜人解放大同盟发动群众。由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在协议中规定，在苏联红军管制时期，任何党派不准活动，所以党组织只能处于秘密状态，这两个大同盟便成为党领导下的公开的群众组织。中共中央东北局组建并到达沈阳后，东北党委会的使命完

成，并入中共中央东北局。10月13日，中共东北局任命组建的牡丹江军区司令李荆璞、副政委谭文邦、政治部主任张静之一行到达牡丹江市。李荆璞与金光侠、陶雨峰研究如何尽快地实际掌握牡丹江市的政权，经研究并取得苏联红军的支持，于次日公开武装接管牡丹江市政府，李荆璞为市长，谷怀贵为第一副市长，金东烈、贾静杰（女）为副市长。这标志着牡丹江已实际地掌握在我党手中，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做了重要的奠基。11月初，根据党中央命令，由延安开赴东北的张闻天、李大章、张一明、褚志远、刘泰等24名同志先后到达牡丹江市，使党的领导力量得到极大的加强。24日，东北人民民主大同盟牡丹江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张一明任委员长，刘泰为工农部长，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群众基础。北满分局12月8日调整中共牡丹江地委组成人员，李大章任地委书记，金光侠为副书记，地委隶属北满分局领导。28日，中共牡丹江地委召开扩大会议，地委书记李大章在讲话中明确提出牡丹江当前的四项工作任务：一、发动群众；二、建立武装；三、改造政权；四、肃清汉奸特务。1946年2月20日，牡丹江临时参议会开幕，地委书记李大章在会上做了报告，第一任市长李荆璞也在会上讲话。会议历时三天，讨论通过了张闻天主持起草的《牡丹江市政府施政纲要》和《牡丹江敌伪土地没收分配条例》，选出市政府行政委员会，选举褚志远为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市长。这次会议使牡丹江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工作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依据。中共东北局和中共北满分局根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及牡丹江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对牡丹江党的建设工作的领导力度。4月18日，中共北满分局决定撤销中共牡丹江地委，成立中共绥宁省委，隶属北满分局领导。省委书记李大章，副书记金光侠，委员李荆璞、张静之、刘贤权。省委机关驻牡丹江市。由此牡丹江市在这一地区中心城市地位和作用便确立下来。5月，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并入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东北局

的决定，中共绥宁省委改为中共绥宁分省委，隶属中共合江省委领导，分省委机关仍驻牡丹江市。同月，中共牡丹江市委员会正式成立，市委书记张烈。10月，根据东北局的决定，中共绥宁分省委改为中共牡丹江地委，隶属中共东北局领导，李大章任地委书记。11月，李大章调东北局工作，何伟接任牡丹江地委书记。1947年8月6日，东北局作出《关于成立牡丹江省委的决定》，指出：“牡丹江、东安两分区均为工业建设地区，为有计划统一进行今后的建设工作，兹决定牡丹江与东安两分区合并为一个省，成立牡丹江省委，由何伟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并代理省委书记”。同月，根据东北局的决定，撤销了中共牡丹江地委，正式成立了中共牡丹江省委，隶属东北局直接领导。1948年6月16日，东北局作出决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取消牡丹江省委（包括省府、军区），牡丹江之东安地区划给合江省委管辖，牡丹江省委改为地委，归松江省委管辖。”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党组织在牡丹江得到极大的发展。1948年3、4月份，根据省委指示开始分期分批公开建党。截止1948年6月，牡丹江党员人数已达4630人（含原东安地区），其中关内来的老党员600余人，新发展党员4000余人，党员占人口总数的0.45%；党支部总数达169个。这就是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工作取得辉煌成就的坚实的领导基础。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我党迅速派出二万干部和十一万大军奔赴东北。但这二万干部，对于东北的广大地区和建党、建军、建政的繁重任务来说，实在太少太少。所以我党进入东北首先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建党、建军、建政都缺乏大批干部。当时一个县级地区我党只能派去三、五人，有的甚至只能派去一个人。能否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选拔、培养、造就一支满足工作需要的干部队伍，就成为能否建成巩固的根据地的关键环节。所以，中共派到牡丹江的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一到牡丹江，就抽出极大精力狠抓干部的选拔

培养工作。李荆璞、谭文邦、张静之到达牡丹江，在当晚与金光侠、陶雨峰开会研究工作时，确定的第二项工作，就是由张静之去宁安组建军政干校。根据这一决定，张静之随即动身到宁安于11月创建了宁安军政干校，校长张静之，由宁安党组织和地下党员从爱国青年中推荐了200多名学员接受三个月的培训。学校完全实行供给制，学生按军事编制为区队，课程开设军事、政治两科，教材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教师主要从延安来的部队中临时抽调。张闻天同志到牡丹江后，发现了干部严重缺乏的情况，提出：“学延安的办法，举行行政干部训练班，”并确定以有文化的爱国青年为主要培养对象。第一批学员60人，张闻天亲自讲课，李大章等领导也分担部分课程。训练班一个月一期。学员毕业后，都充实到政府各部门工作。1946年3月4日，根据张闻天同志提议创办的宁安学院举行开学典礼，宁安县委书记王树本兼学院院长。学院设高中五个班、初中六个班和一个干部部，共有学员500多人，开设文化课、政治课、历史课。政治课主要讲授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张闻天、田松等主要领导经常亲自给学员讲课。此外，还有绥宁省军区教导队、海军二支队干部教导营、牡南军分区军政干部学校等。这些学校在很短的时间里，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培养了一大批我党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所急需的干部。这些干部以优良的政治素质和饱满的革命热情，忘我地投身于艰巨的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工作，成为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因为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建党工作只能处于秘密状态，党员身份不公开。但是这些同志（包括土改工作团的同志），凭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为名，不为利，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身心地扑在党的事业上，经过革命斗争血与火的洗礼，迅速成长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骨干，从这些人中挑选组成的“南下干部团”就是这些人的代表。这些同志的出色工作，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

支持，所以当开始公开建党时，广大群众看到平时积极工作的同志都是共产党员，深受教育和鼓舞，纷纷踊跃报名申请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深切地感受到，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党的干部队伍并且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党的事业该是多么的重要。

(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武装力量，是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取得成功的必需的军事保障。反动派绝不会甘心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国民党反动派和我党争夺牡丹江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人们的正统思想，由吉林国民党党部于8月22日，派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员厚颜无耻地来接收牡丹江。国民党东北九省党务专员办事处派孙庭奇回到牡丹江，以牡丹江市为中心，扩建国民党组织，收编敌伪残余和土匪武装，与我党抢占牡丹江。10月8日，孙庭奇代表国民党吉林省党部挂出“国民党牡丹江党务专员办事处”和“牡丹江市国民党部”的牌子。日伪政权时期的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知名人士”摇身一变与国民党特务拼凑了“牡丹江市政府”，还建立了公安局，建立了二、三百人的武装警察队，热盼国民党政府尽快来接收。当时，牡丹江有国民党党员200多名和数百名三青团员，并出版“合江日报”和油印的“北斗报”，恶毒诬蔑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为国民党反动派涂脂抹粉。而国民党委任的土匪武装和日伪残余，数万之众，更是虎视眈眈，秣马厉兵，只等“国军”一到，便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劳苦大众流血牺牲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夺回的东北大好河山，变成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因此，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就成为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必要前提。1945年8月2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3日，苏联红军红旗

集团军进军牡丹江。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同日，朱德总司令发出七道命令，命令吕正操、张学思、李远昌、曾克林等部队进入东北，协同苏军作战。8月16日，苏联红军攻克牡丹江，金光侠、陶雨峰率20多名抗联战士回到牡丹江，并迅速和先期派遣到牡丹江各地的抗联小分队及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成为最基本的人民武装。金光侠以苏联红军驻牡丹江司令部副司令的公开身份，在很短的时间里，帮助两个大同盟发展了一千多会员，为建立人民武装准备了重要的兵源。10月13日，中共东北局任命组建的牡丹江军区司令李荆璞、副政委谭文邦、政治部主任张静之一行到达牡丹江市，在与金光侠、陶雨峰研究后，当日即在原满铁医院挂出了“国民革命军牡丹江军区司令部”的牌子，成为当时党在牡丹江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金光侠、陶雨峰组建的40多人的武装警察队被改编为军区警卫连，并于当晚从两个大同盟动员部分会员和部分失业的年轻铁路工人参军，把警卫连扩大到200多人，又由陶雨峰从苏军缴获日伪军武器仓库里运来比较新的枪支弹药，武装了军区警卫连。正是靠了这支武装，加上得到苏联红军的支持，李荆璞于第二天接管了牡丹江市政府。不久，又把原抗联五军一师从事抗日活动时的根据地群众“8·15”和夺取日伪武器武装起来的700多人的队伍编成军区警卫营。下旬，359旅一个团奉命由团政委董振东率领扩建为东北挺进支队到达牡丹江，改为牡丹江省军区直属十四团，团长董振东，政委胡子美（胡松），金光侠第二次动员盟员参军，陶雨峰则去动员失业的铁路和伐木工人入伍，仅3天时间，十四团就扩大到近3千人。之后，又组建了十五团，并通过收编地方民团等武装，组建了十二团、十七团、十九团、二十六团。这四支队伍实际是国民党土匪武装，他们只是看到共产党掌了权，干等“国军”不到，才暂时投靠我军以待时机。由于当时我军的兵力和干部严重缺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彻底改造这些武装，致使他们“明八路，暗中央”，遇有时机就叛乱，残酷杀害我党派到

这些武装中的政治干部，据 1947 年的统计，牡丹江地区的叛匪就杀害我党干部 40 多人。这无疑增大了军事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程度。此间，各县也建立了县大队等武装，同时，对重要地区的土匪和叛匪初步进行了清剿，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1946 年 2 月 2 日，由田松、李伟率领的原山东海军支队 2 支队到达牡丹江，被编为牡丹江军区 2 支队。2 支队的到来，大大增强了我军在牡丹江的军事实力，剿匪斗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另一方面，1946 年 4、5 月间，苏联红军回国，并根据与国民党签订的协议，将东北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我军从大城市撤离，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帮助下，海空并进，大批开进到长春。敌伪残余和国民党特务、土匪，以为时机到了，纷纷叛乱暴动，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猖狂的反扑。5 月 1 日，以王枝林为首的“国民党挺进军”，勾结奸细发动暴乱，抓走东宁县长杨森林、公安局长李东升、保安副大队长刘凤山、排长乔德林等。4 日，王枝林部匪徒徐佩、邢介山同混入绥芬河公安局内部的解景繁内外勾结发动武装暴乱，区长赵长华、公安局长肖风云、队长孙振环等被杀害。8 日，这伙匪徒勾结孙忠奎、姜开山、宋明昌等 500 多人攻打绥阳县城。在内奸卢凤歧、刘发先配合下，叛匪攻占了绥阳县城，县长魏绍武及妻子、儿子、女儿，公安局长于佑民等几十人遇害。15 日夜，军区司令部警卫排长张德发勾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松江省宣抚特派员办事处第八支队”少将司令王超、上校副司令兼参谋长姜学容等，在牡丹江市发动反革命暴乱。经过浴血奋战，这些反革命暴乱都被彻底平息，剿匪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平息这些反革命暴乱和两年多的剿匪斗争中，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在共和国的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候，把一腔热血洒在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上。以著名的侦察英雄杨子荣及其传奇般的故事为代表，将这段林海雪原中动人的岁月，冰雕雪塑般屹立在牡丹江这块祖国神奇的土地上，成为一种永久的骄傲与象征。在武装剿匪的同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北满分

局委员张闻天，以中共北满分局代表的身份来到牡丹江，组成土改工作团并亲任总团长，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揭开了牡丹江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序幕。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完成了意义重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夙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和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信任之情，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工作。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军政素质不断提高，真正成为人民政权的坚强柱石。广大劳动群众，通过剿匪、反奸清算、土改等亲身经历，也深切感受到：要彻底摆脱压迫与剥削，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尽快消灭蒋家王朝，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因此，牡丹江市广大人民群众，把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看成是自己的光荣职责，掀起了“保家卫国”参军支前的热潮，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哥嫂姐妹送兄弟，以及干部带头参军的动人场面。据统计，到1949年末，全市共有3960名青年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走上解放全中国的前线。而牡丹江市广大人民群众为支援解放战争，出民工、担架，捐款捐物，更是功绩卓著。

(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革命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的支撑，任何政权组织都不可能正常运作并坚持持久。牡丹江虽然回到了人民手中，但我党接管的完全是一个烂摊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垄断控制下，牡丹江的民族工商业，只能在夹缝中小规模艰难谋生。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日本人控制下的大工业大商号纷纷倒闭和被有计划地破坏，而部分民族工商业者，或存有“正统”观念，加之对我党政策还不够认识和了解，等待观望，不敢恢复生产和营业；或为躲避战乱而关闭企业甚至弃厂弃店。整个社会百业萧条，商品奇缺，金融秩序

混乱，物价不稳，人心难安。牡丹江刚刚回到人民手中，建军、建政、剿匪急需大量资金。牡丹江解放了，东北和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支援东北和全国解放作为解放区义不容辞的责任，更需要大量的物资和资金。因此，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就成为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我党及党的绝大多数干部对城市经济工作还比较生疏，但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正确地制定并认真地执行党在城市的工商业政策，不仅使牡丹江的城市工商业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在实践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城市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1945年10月28日，牡丹江发电所经过工人群众的奋力抢修，一台机组恢复发电，为发展生产提供了初步的动力。1946年1月10日，牡丹江实业银行开业，发行五元、十元、百元三种地方纸币在牡丹江全区流通，为统一币制、稳定金融秩序、发展生产奠定了基础。党和人民政府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首先把团结、教育、帮助个体民族工商业者，使他们尽快恢复和扩大生产作为城市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1945年9月25日，牡丹江的民族工商业者开会，对牡丹江市商务会进行了改造，进步人士陈孝德当选为会长，不久，另一进步人士王子玉被补选为副会长。这是为工商业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一方面，李大章等省、市主要领导，非常重视团结陈孝德、王子玉，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仅亲自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而且把他们安排在省、市领导机关担任一定的职务，请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影响与号召力。市民主政府成立后，在1946年2月22日牡丹江临时参议会上，陈孝德和王子玉被选为市参议员；4月8日，在绥宁省首届临时参议会上，陈孝德被选为省参议员。同时，人民政府还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为私营工商业者恢复发展生产排忧解难。1946年12月，市政府决定由东北银行牡丹江分行发放300万元（苏联红军券）低息贷款，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工业。1947年到1948年，

市政府还帮助市商务会吸收游资 20 亿东北币，用以发展私营企业。市政府还积极为私营工商业者解决恢复和发展生产急需的建筑材料、机器设备、厂房，并协助聘请技师等。广大工商业者看到党和人民政府真心实意对待工商业者，很快打消了各种顾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其次，狠抓了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的宣传和认真贯彻执行。《牡丹江日报》创刊的第二天，即 1945 年 12 月 20 日，就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时局的具体主张》一文。文章指出：要恢复发展各种公营企业，保护奖励私人工商业，以繁荣东北的经济，充裕东北人民的生活。1946 年 1 月 1 日，《牡丹江日报》又刊载了《牡丹江市政府施政纲要》。其第八条是：“发展工商业。恢复与发展公营企业，保护与奖励私人企业，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公买公卖的自由贸易，反对贱买贵卖的统制贸易，繁荣市场，发展生产与消费的大众合作社，调剂输出入，整理币制，稳定金融。”1946 年 5 月 10 日，绥宁省代主席张静之召开了有 150 个工商业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张静之阐明了民主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并表示：“民主政府废除一切经济统治，坚决实行贸易自由、扶助正当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张静之还宣布了省政府有关决定：禁止任意没收敌产，除军火外，所有私人获得日伪遗留物资，都可以到市场上公平买卖，调剂物资余缺。这些政策给广大私人工商业者吃了定心丸，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形成了牡丹江城市经济迅速恢复和长足发展的良好局面。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执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个别地方和个别环节也出现过“左”的偏向，侵犯了工商业者的正当权益。市委、市政府发现问题后，及时进行了纠正。1948 年 1 月 18 日，市委书记张烈主持召开市委扩大会议，检讨了贯彻党的保护工商业政策的偏差，决定对被侵犯正当权益的工商业者道歉补偿。在此之前，1 月 10 日，中共牡丹江省委下发了《关于保护城市工商业问题的通知》；4 月，中共牡丹江市委、市政府又先后颁发了一、二、三号布告，

宣布政府保护和发展私营工商业政策的实施办法。5月10日，市政府又发出了《牡丹江市工商业保护发展与管理条例暨奖励发明创造暂行条例》。这些政策为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保障私营工商业者的人权、财权、产权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保证了牡丹江城市经济的稳定发展。再次，党和人民政府按照“向着工业化的牡丹江方向努力，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针，并根据牡丹江工业原料多、工业基础较好的实际情况，试办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分为公私合资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两种。1946年3月中旬，为满足剿匪斗争的需要，由牡丹江军区军工部出资300万元（苏联红军票），与牡丹江天发东铸造铁工厂合资创办了“公私合营天发东铸造厂”，牡丹江军区代表任经理，天发东厂代表任副经理，为部队生产手榴弹壳；4月20日，市政府和市商务会，各出资50万元，创办了利民火柴股份有限公司；5月20日，公私合股纺纱厂开工，股金共100万元，其中政府持股80万元，私人持股20万元。1948年2月1日，市政府投资1000万元，商务会投资3670万元的新民胶鞋厂开工。还有象牡丹江实业银行、牡丹江衡器厂等不少工商企业，都有“官方”股份的投入，在私营企业中占有相当比重，使这些企业的性质蕴含着质的变化。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随着时局的变化，多数经营的时间不长，却为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难得的经验。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扶持和真诚帮助，牡丹江城市私营工商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已从接管初期的400余家，恢复发展到2888家（不含摊贩和行商户数），其中工业1397家；从业人员8559人，其中工业5445人；共有资金6664070万元（东北币）。这些，为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经济后盾。据不完全统计，从我党接管牡丹江到1948年末，全市工商业者支援民主联军捐款合人民币326.7万元，大米、白面10万斤，生猪2050头，牛20头，军鞋一万双，布3000匹，以及大量日用品。当解放军南下时，工商界又一次募

捐东北币 13.5 亿元，军鞋一万双，棉被 350 床及其它用品。可以说，城市经济特别是私营工商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建立牡丹江根据地，支援东北乃至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也说明，我党当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是正确的，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

(五)

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庄严承诺。而我们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工作无疑就是实践这个承诺的伟大过程。实践这个承诺的一切努力，便是中国共产党人远大理想和脚踏实地的雄才伟略的生动写照。“三座大山”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军事统治，特别是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铁蹄的蹂躏，不仅使牡丹江城市面貌凋蔽破败，而且社会秩序混乱，黄赌毒、封建迷信和反动会道门泛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伪投降，但旧的社会基础不可能随之自然消亡，必须经过艰苦细致的改造工作，才有可能形成人民政权赖以巩固发展的新的社会基础。我党接管牡丹江市政府后，立即着手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很快在省、市乃至县一级建立起临时参议会，团结各族各界共商国是。牡丹江市临时参议会讨论通过的《牡丹江市政府施政纲要》，成为指导社会改造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人民政权从组建到初步巩固完善，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1948 年 12 月，全市土地改革胜利完成之后，在中共牡丹江市委领导下，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基层建政工作。依据《选举条例（草案）》规定的程序，先是试点，试点单位普遍办了建政训练班，对参加建政工作的干部培训，然后工作队到城乡基层开展普选工作。为了提高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工作队都特别注意宣传党的阶级政策，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增强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同时

把建政同整顿群众组织、整党建党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由于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极大的尊重和保护，确保了基层建政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建政质量，产生了村长、街长，并组成村、街委员会。接着再召开各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长、副区长。由于牡丹江市解放初期的基层建政工作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组建的基层政权，普遍受到劳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基层政权的高效运转，在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改造社会丑恶现象、支援解放战争等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民政权一经建立，首先废除了旧的保甲制度和警察制度。1945年12月7日，牡丹江市政府接收了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对罪大恶极者予以严惩，对原有人员按警衔发给退職金和粮食予以辞退，重新组建了牡丹江市公安局，军区任命孙长德为局长，孔繁斌为副局长。市公安局重新组建后，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花费三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人口普查，以掌握牡丹江市常驻人口的自然状况和政治状况，为社会改造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1946年3月开始，历时五个月，市政府对日伪反动残余势力集中打击。市公安局抽调30名干部深入基层单位进行反动党团敌特分子登记工作，登记后，依法逮捕4人，开除11人。1948年5月14日，市公安局公布治安工作条例；10月，市公安局在试点取得经验后，开始发居民证，并于11月12日发布了关于居民证使用办法的布告。市公安局和成立于1946年12月2日的牡丹江市地方法院，作为重要的国家机器，在社会改造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旧社会的丑恶现象集中体现在黄赌毒上，流毒深广，成为腐蚀人们思想，危害人们健康，滋生污泥浊水的罪恶的渊藪。牡丹江市存在的上述社会丑恶现象完全是由日伪的反动统治一手造成的，并且随着日伪统治的加深而蔓延发展。以妓院为例，是先有日本妓院，即由日本人开办，由日本年轻妇女专为日军高级军官提供性服务的。后来又有了韩国妓院，即日本人从被其占领的朝

鲜掳来的“随军慰安妇”。再后来才有因日伪残酷压迫无法生存而被迫卖笑为生的中国妓院。这些妓院主要分布在永安里（原京剧院附近）、西安里（现西安区政府址）、东安里（东安影剧院周围），还有安福里、吉安里等。市公安局在清查户口时，查牡丹江曾有妓院 150 多处，妓女 1500 多人。日本投降后，走死逃亡，尚有 300 多妓女苦度屈辱日。而烟馆尚有近 50 家，主要分布在柴市街、七星街和立新街，烟民达 4846 人。对这些丑恶现象，人民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和坚决。《牡丹江市政府施政纲要》明确规定：废除娼妓，严禁烟赌。1946 年 1 月，牡丹江市政府发布了《暂行禁烟规程》共 16 款；不久又发布了《牡丹江市禁烟禁毒计划》。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民政府十分注重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都根据人民政府的统一要求，结合各自的工作特点，主动抓赌、收缴各种赌具。对抓住的赌博者，轻者在群众大会上坦白检讨，保证不再参赌；屡教不改者和设赌抽红者，送公安机关惩治。逢年过节，也是赌博活动最为严重之时，人民政府和各群众组织便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使赌博之风很快被煞住。禁吸大烟也是这样，人民政府发布禁烟布告，勒令关闭烟馆，吸大烟者在规定的时限内，到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登记，并上交烟具。一般吸食者由其所在单位实行集中管制，工作照常，但不准回家，不许随便出入，家属按时送饭，由儿童团负责看守。因为对吸大烟，老百姓早就深恶痛绝，人民政府的禁令深得民心，所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配合人民政府的行动，向有关部门检举揭发并协助人民政府严格帮教吸大烟者，使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即在华夏大地泛滥，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精神和肉体的“毒”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禁绝。在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改造过程中，最艰难、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取缔妓院，改造妓女。1946 年 3 月 9 日，市妇女联合会在民主大戏院召开妓女解放大会，各界妇女千余人、妓女 40 多人、窑主老鸨子 20 多人参加了